

雁声远过潇湘去

——大雁与古琴曲《平沙落雁》

□ 麻文广



在古人的诗文中，大雁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征鸿”“归雁”“衡阳雁”“孤鸿”“飞鸿”等大雁的称呼，时常可见。“人归日落雁后，思发在花前”（薛道衡《人日思归》），“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杜甫《月夜忆舍弟》），“雁声远过潇湘去，十二楼中月自明”（温庭筠《雁瑟怨》），“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范仲淹《渔家傲·秋思》），“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欧阳修《戏答元珍》），古诗词中关于大雁的佳句频出，可以说，没有哪个大诗人没写过大雁。

或为宦官游，或流寓他乡，或求学漫游，每逢佳节和秋风萧瑟之时，孤身在外的古代文人难免升起思乡怀亲之情，这时，看见天空中的雁阵或孤雁，羁旅的伤感之情便找到了最恰切的寄托之物。

“雁南飞”的概念，最早见于战国宋玉《九辩》中的“雁雍雍而南游兮”。汉武帝《秋风辞》有“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汉代张衡首次指出雁南飞的终点就是衡阳，他在《西京赋》中说“季秋就温，南翔衡阳”，在《鸿赋》中又说“南寓衡阳，避祁寒也”，认为大雁在秋天去衡阳休憩避寒。

在传统文化中，大雁不仅有传情达意的功能，同时也是忠贞爱情、忠信仁义等优秀品格的象征。亲友之间以鸿雁传书。寄居旷野，远离人烟的大雁，被文人用来抒发“隐逸”情怀。

用“衡阳雁”来喻指大雁，可能始自南北朝诗人庾信，其诗句“近学衡阳雁，秋分俱渡河”（《和侃法师三绝诗·二》）借助秋分时节南飞衡阳的大雁，抒发对乡土的眷恋之情。隋代，因为受大雁文化影响，原有的南岳衡山第一峰“烟雨山”被改名为“回雁峰”，“乘云禅寺”则改名为“雁峰寺”。自此，衡阳及其所处的潇湘之地与大雁文化之间建立起稳定的关系，或者说在文人心中形成了“衡阳——大雁”这一特殊的情感结构。每当望见飞雁抑或落雁之时，他们的情感便在胸中涌动。

衡阳又被称作“雁城”，其特殊的文化隐喻吸引文人竞相书写。南飞的大雁之所以会在衡阳落脚，与此地优美的自然环境关系密切相关。即使到了冬天，衡阳的湖泊也不会结冰，而且水草富足，非常适合大雁生存。正所谓“衡山截断南方北，回雁峰南障烟烟”（李绅《逾岭断止荒陬抵高要》），古人认为衡阳以北比较冷，而再往南，空气中有害的瘴气就多了起来。

每到寒秋，成群的大雁与潇湘之地的辽阔江天融为一体，烟云缭绕间充满诗情画意。宋代山水画家宋迪就将目光投向烟波微茫的潇湘景观，以平沙落雁、远浦帆归、山市

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为“八景”，绘成《潇湘八景图》流传于世，使潇湘之地的文化品格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扬。古琴曲《平沙落雁》则通过宛转悠扬的琴声，描摹出雁落秋江的苍茫辽远之境，同时也展现了文人的高远胸怀与旷达精神。

古琴曲《平沙落雁》的谱本较早见于明代崇祯七年（1634年）刊印的《古音正宗》，此后刊载该琴曲的琴谱有近百种之多。原曲出自何人之手，有很多种说法，如唐代陈子昂说、宋代毛逊说、明代朱权说等。朱权是朱元璋第十七子，他少年得意，晚年归隐，成为民间戏曲作家和理论家。关于朱权与《平沙落雁》，曾有这样一个故事。据说朱权在追逐南飞大雁之际，看到雁群从南昌飞至衡阳回雁峰的东洲岛，不再南飞。他认为，或许大雁觉得此处气候适宜，景色优美，因此才不忍离开此地。正值天朗气清，雁群列队飞翔，于回雁峰之上盘旋，场面十分壮观。它们飞累后便落在东洲岛的沙滩上，缓慢优雅地散步，构成一幅平沙落雁的美景。朱权被眼前之景所吸引，完全沉醉其中，壮观的景色让他想起自己跌宕起伏的人生，心潮澎湃。于是朱权奋笔疾书，谱成一曲流传后世的《平沙落雁》。

如果说诗词中的大雁往往有乡思之情或孤傲之感，那么琴曲《平沙落雁》主要体现的则是群雁与美景融为一体的祥和静谧之感。《天闻阁琴谱》写道，此曲“盖取其秋高气爽，

风静沙平，云程万里，天际飞鸿。借鸿鹄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也”。可以说，古琴曲《平沙落雁》以音乐的方式拓宽了大雁文化的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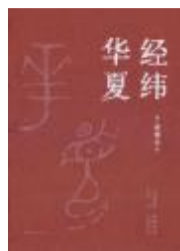
古琴曲所描摹的景致显然发生在秋高时节，舒缓的旋律带领听者走进秋日的潇湘大地。随着琴声渐快，一只只鸿雁缓缓起飞，原本宁静的图景多了几分灵动，自然中跃动着生命的节奏，使人心旷神怡。舞动的鸿雁与苍茫的天际浑然一体，于秋高之际更显“风静沙平，云程万里”的开阔景致，人们的胸怀也由此打开。随着乐曲的婉转变化，略显冷清的场景瞬间增添了雁群的鸣叫之声。当初来大雁与舞动的雁群合成一体，逐队纷飞时，透过琴声，我们能够感悟到雁群的“倏隐倏显，若往若来”。到了乐曲末尾，琴声逐渐变慢、变弱，不再是初起的宛转悠扬，而是徐缓自然，好似雁群一字归队，逐只降落，雁阵纷纷落在湖畔，场面阔大。雁群回落在平沙之上，人们的心境逐渐平静下来，最后归于恬静、和谐、安稳。

《平沙落雁》虽出现较晚，却是近三百年来流传最广的古琴曲之一。不得不说，传统文化中深厚的大雁文化，赋予了古琴曲《平沙落雁》厚重的底蕴，而衡阳和潇湘的地域文化塑造了古琴曲独特的地域风格。

今天，我们立足传统文化沃土，也需汲取地域文化养分，才能创作出别开生面的琴曲、绘画、文学等新的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作品。（据光明网）



《经纬华夏》



作者：许倬云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
“我要从世界看中国，再从中国看世界。”围绕着这一发端，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以九十高龄迎难而上，八易其稿，结撰出一部华夏文明从成长到成型的传记。作者跳出中国文化内部演变的叙述，以“大历史”的观看视角与思维方式，对华夏内外的历史互动进行了全新的归纳排列，再现了中国大地上人群、族群、文化互动融合的轨迹。在超越五千年的长程叙述中，作者借由对中国地方性文化如何交缠为一，以及中国如何应对来自世界之冲击的细致分析，最终揭示了华夏文明能够延续至今，并将绵延永在的核心与奥秘，以赤子之心瞻见了一个有根底、有方向的中国。

《地名里的中国》



作者：《国家人文历史》编著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地名，过去与现在，先人与今人相互交会，形成中华文化的滔滔洪流。本书在讲述地名时，是按照地名得名的内在历史、文化逻辑进行分类，而非简单地按地理信息进行区分，由此读者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在小小的地名之上，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中华先祖的生活劳作，更反映出了他们深入骨髓的道德意识、审美偏好等最本源的文化要素。这种文化要素一以贯之，穿越千年流传至今，也在潜意识中影响、塑造着当今的中国人。

《我们为什么吃（太多）：食欲的新科学》



作者：【英】安德烈·詹金森
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不谈“体重定点”的减肥方法都是耍流氓！如果你，喝口水就发胖，瞅一眼蛋糕都长肉；如果你，持续过劳，越累越饿，越饿吃越多，吃越多越累；如果你，长期节食减肥，始终无法奏效；如果你，曾是减肥药物监督员，加工食品爱好者，在自我抗争的道路上屡战屡败……错不在你，请在本书的指导下，重回正途。

展现行走中的动人风景

□ 欧阳德彬



作家张

鸿主动走出都市生活的舒适区，行走在祖国的边陲小镇，名胜古迹，领略外在与内在的双重风景，孕育出一篇篇精美厚重的散文。她的散文集《月白如纸》，就是一本关于智性之旅的书。

张鸿行走在边疆，不是普通意义上对于自然景观的探险寻奇，而是人文意义上的相逢相知，其文本叙述的重心是生动鲜活的个人。从这个角度来审视，她的散文具有小说的某些特点，可以归类为跨文体写作。比如，书中的新疆老张，起初得不到“我”的信任和好感，直到不经意间呈现出独特的一面。新疆老张重情重义，到途经的烈士陵园祭拜。他就和那位住在阿勒泰山脚下也拉曼村里

的老军人艾斯肯一样，对烈士心怀真挚的热爱与崇敬。此里卓玛健谈爱美，是当地人眼中的“疯子”。在“我”看来，她却是快乐与神圣的化身，引发“我”深层次的思考。这些人物的形象，在张鸿笔下是动态的，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俨然如小说人物，不读到最后一行，难以给人物作出判断。这恰恰印证了本书后记中张鸿自我陈述的散文观：“散文也是多变的，她有着各种可能性，如水一般，可涓涓、可涿涿、可汤汤，她甚至野性放肆，不确定走向。”

翻阅《月白如纸》，不知道张鸿将我们带往何方。她的散文书写主题丰富，写法多变，超越了文体的一般规定。因为难以对其进行归类，更见其丰富与深邃。《达洛维太大的时光》和《怒放的弗里达》以电影作为切入点，可以视为影评，也可以将其当成作家和画家的评传。张鸿以女性眼光对女艺术家的生活和作品加以审视，洞察其内在的情感需求和

心灵上的隐秘孤独，精细、深刻而富有见地。读者为她笔下呈现出来的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超然和孤独而动容，也为弗里达的心灵所震撼。

书中有一部分散文篇章从主题上看属于文化地理散文的范畴。张鸿面对文物古迹、勾勒相关的历史文化经纬，站在国家历史和民族文化的角度，进行全方位的审视和省思。比如《江夏的桥》中，张鸿站在桥上，思接千载，联想到《楚辞》《汉书》《三国演义》《江夏县志》等典籍的相关记载，进而由具体的江夏南桥延展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桥，将桥升华为具有普遍性的美学意象。

《水墨影像三清山》是这类散文的佳作。“窗于我是局限，出门来，仰目环视群峰，山色如黛，但背景是透着清亮的天空，这一切似乎都处在悬浮之中。”优美的语言呈现的不仅是大好河山的自然风光，更是融合了中国式禅意和神韵的内心风景。“第二天一

大早，出门走着，感觉空气是再好不过了，明显能触摸到当中布满什么密匝匝的粒子。有东西在透明中缓缓滑行，忽高忽低，应该是还带着细细的声音的。”她笔下的风景富于动感，还有声音，那是唯有沉静敏感的心灵才能建构的艺术世界。“我们已经与大部队落下了不止一小时的行程，迷路了。没有‘规矩’，就有了心性的酣畅。”可以想象，张鸿看似参加组团游览，实际上经常“掉队”，甚至有意为之，因为只有孤身一人地行走与漫游，才更容易发现那些“超人”的事物。

本书后记的标题“那些故事是超人间的”，堪称对这本散文集精神追求的高度总结，张鸿用一种看似朴实无华的漫漫笔调，完成对生活现场的深入探索，把自我解放出来，继而完成精神上的成长。这是她的作品难能可贵的一面，也决定了本书的精神质地。（据光明网）

江澄波——百年书店里的古籍人生

□ 黄菲菲



江澄波老先生 1926 年出生于苏州，如今已 97 岁高龄。家中自祖辈起经营古旧书店，一生与古籍打交道的他，精于版本目录、修复鉴定之学，被誉为“苏州一宝”“书林活字典”。他所著的《古刻名抄经眼录》《江苏活字印书》《吴门版书丛谈》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2022 年底，由江澄波口述的《书船长载江南月：文学山房江澄波口述史》问世，并获评“2022 苏版好书”，入选 2023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他的人生经历也再次引起人们关注。带着几分好奇，我们来到江苏省苏州市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走进这家小小的文学山房，采访了江澄波老先生。

文学山房，苏州城的文化符号
苏州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闹中取静的钮家巷里，有一家名为“文学山房”的小小书店。它位于苏州状元博物馆斜对面，玻璃门内，满屋的古旧书籍是引人注目。店门上方，暗红色的砖石上，7 个金色繁体大字“文学山房”古朴大气，但却没有署名。了解书法的人能看出来，这是苏州书画家马伯乐的手笔。走进店里，文学山房三面都是高高的实木书架，各种古旧书排列得整整齐齐，满满当当。其中东侧靠墙的书架上，大多是线装古籍，每部书中夹着一张签条，上面写着书名、编号等信息，方便找人翻阅；正对面的书架上，多是各类大众文史读物；西侧靠墙的书架上，以

苏州地方历史文化读物为主。中间有一张大桌子，上面摆着题材各异的旧时出版物。而进门左手边，有一张圈椅，那是江澄波的“专座”，他每天就坐在这张椅子上，等待四方读者和访客。旁边的一张凳子，便是为进店的读者和访客准备的。

我们闲聊起来，谈到“书房”这个话题，江老滔滔不绝。文学山房虽是书店，但也是他的书房。江澄波在文学山房出生、成长、学习、生活、工作。“文学山房里有我一生的记忆啊。”老人说。不过，这间小小的房子并不是最初的文学山房。

光绪二十五年（1899 年），江澄波的祖父江杏溪在苏州护龙街（今人民路）嘉余坊口创办文学山房书店，专门经营古书买卖，这就是最初的文学山房。创办后，先是赶上黄葆年在苏州创办归群草堂讲学，学子云集有购书需求；辛亥革命后，在苏官员离开，留下众多藏书，文学山房业务迅速发展，在业内形成良好口碑。到 1931 年，江澄波 5 岁时，最初的店面已不能适应业务需要，于是书店迁往嘉余坊斜对面的大井巷口，地址是护龙街 707 号。新中国成立后，护龙街改名为人民路，文学山房的地址也改为人民路 326 号。到 1956 年实行公私合营，文学山房改名为“公私合营文学山房”，仍由江澄波和父亲负责。1958 年，文学山房成为苏州古旧书店下属的 4 个门市部之一。1961 年，其他 3 个门市部撤销，只留下文学山房这一个，改称“古旧书门市部”。至此，文学山房的历史告一段落。

2001 年，75 岁的江澄波已经退休，家中经济状况不佳。为了攒钱供两个孙女读大学，他重新干起老本行，学习祖父白手起家，开办书店。由于原先的文学山房已合并，为避免误会，新书店一开始定名为“文育山房”，地址是建新巷 25 号，经过几次变动最终搬迁到钮家巷现址，一开就是十几年。可喜的是，2012 年，在广大读者和媒体的呼吁下，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江澄波的书店恢复了百年老店“文学山房”的招牌，让苏州从此多了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符号。

谈及这些历史，江老如数家珍。脸上认真的

表情里，有对过往的怀念，也有对时光如流水的感慨。

下苦功夫，在实践中习得本领

1931 年，文学山房搬到大井巷口时，店面是传统的前店后宅形式。江澄波就在店里长大，跟着祖父和父亲学习版本鉴定、装订修复、刻印校对等知识，也跟着祖父和父亲外出访书，学习做生意，逐渐练就了过硬的本领。

“治学是没有捷径的，最要紧是下苦功夫。”回忆起跟着祖父和父亲学习古籍知识的时光，江老这样说。那时在店里，为了快速熟悉古籍书目，掌握经史子集的各种版本信息，江澄波用的是最“笨”的方法——背书目。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看的第一本书目是莫友芝的《邵亭知见传本书目》。莫友芝曾做过曾国藩的幕僚，曾国藩创办江南官书局，莫友芝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潜心研究版本目录学，在这方面颇有建树。他的《邵亭知见传本书目》被后人认为是版本目录学的扛鼎之作。江老说自己看这本书目，一开始是硬着头皮看，慢慢地有了一点心得。通过将书目与真书对照着看，他就记住了，并且能够背下来。背完一本，再换一本，长年累月下来，江澄波掌握的版本知识已十分丰富。

“光背下来还不够，还得抄。不光抄自己的书目，店里收到书，我自己也要抄列书目。抄写的过程，也是一个知识不断巩固的过程。”江澄波说。其他知识，诸如版本鉴定、书版特征、纸张特色、鉴别真伪、修补修复、铃印、题跋、批校，乃至待人接物、写信回信等，祖父和父亲也都悉心教导。江澄波专心学习，下苦功夫一点一滴积累、领悟，慢慢成长。

除了下功夫，还得长见识。江老回忆，自己小时候曾跟着舅公去过一张纸马作坊，那里的纸马，都是雕版套色印刷出来的。那次经历让他对套印有了直观的认识。再比如那时文学山房的店面和住宅之间，有一个天幔，是招待客人的地方。客人在此看书选书，江澄波也常有机会学习到他们是如何判断书价值高低、真伪优劣的。更不用

说跟同行前辈“交手”，去客人家中送书，这些都是拓宽眼界、增长见识的好机会。

但从事古旧书行业，光懂得这些知识远远不够，江老认为，最重要的是学以致用。他对自己第一次独立收书的经历记忆犹新。那时江澄波才十三四岁，清明节去扫墓路过一个旧货摊，见有 3 本古书，便翻开细看。根据掌握的知识，他认为应是明朝人手写的蓝格抄本，便毫不犹豫买下来。回家后，祖父一番翻看，确定这是宁波范氏天一阁的藏书，不由对他大为赞赏，鼓励他继续努力。再比如外出访书、收书，藏家常常只拿出一两本，请他说说书的情况。“这其实是一种考核。能说出‘干货’，说得好，藏家才愿意继续往下交流；若是说不出个子丑寅卯，那就难有后续了，人家知道你识货啊！”江澄波说。访书、收书的实践，便是检验学习效果的最佳方式了。江澄波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实践中，慢慢成长为古旧书业的专家。

保护古籍，投身中华文化传承

2001 年重开书店，是为了减轻家人的生活负担。如今经济上早已不存在问题，但江澄波还是坚守着这间小小的文学山房，想要把书店继续开下去。“保护古书是我一辈子的事业。”江澄波说。

江老从业 80 多年，见过太多古书的命运流转，也深深为那些因为没有落到对的人手中而遭到毁坏的的古书感到惋惜、无奈。有一次，江老在一户人家见到一部宋版《后汉书》，但可惜纸张已全部黏在了一起，成了一叠“书饼”。原来，抗日战争时期，物主将此书埋在地下，没有妥善密封。他还曾去同治年间福建巡抚的后人家收过书，那时这家已经败落，藏书无人打理。江澄波去时，很多古书外面看起来函套是好好的，但一打开，里面全是空的，书页都被白蚁吃掉了，只剩下一张皮。这令江澄波万分痛心。而战争年代流落海外的中华古籍，被不识货的人当作废品处理掉的古籍，更是不知凡几。让爱人书光是想想就心痛不已。

正因此，从事古籍保护与传承，成为江澄波一生的选择。他年轻时就认为，古旧书从业者最大的使命就是把合适的书送到合适的人手中。胡

玉缙、陈奂、管礼耕、费善庆、沈秉成、丁士涵、叶昌炽、王同愈、冯煦等众多名家的藏书流出时，文学山房都曾积极谋求，将书送到下一任藏家或机构手中。也正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传承中，江澄波见证了一部又一部古书的命运沉浮，也了解到郑振铎、叶景葵、张元济等人在战乱年代是怎样历尽艰辛抢救中华民族文化遗存的。他深刻认识到，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对私人藏家来说，想要世代相传、守护古书，实在是难上加难，毕竟‘累世藏书能几家’啊。”江老说，“公藏机构是古书最好的归宿。”新中国成立后，江澄波有意识地将古书提供给公立收藏机构，经他手入藏各大公藏机构的古书难以数数，其中尤以 10 部宋版书令人印象深刻。

比如《东莱吕太史文集》，这部书原是物主寄放在一家鱼竿店售卖的，店主与江澄波相识，遂主动邀请他掌眼。江澄波一看之下，发现竟是罕见宋本，立刻议价收回，后人藏苏州博物馆。《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则是江澄波在新华书店旧书回收部工作时，一位上海藏书家主动带到苏州出售的，经江澄波鉴定，旧书回收部收购后提供了南京图书馆。苏州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容斋随笔》的流转更是颇为传奇，其中的曲折只有江澄波这些当事人清楚。

江澄波为古籍保护事业做的另一件大事是积极参与促成了过云楼 3/4 藏书归公，入藏南京图书馆。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垂崖张公语录》《字苑类编》《龙川略志》3 部宋版书。正如江老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书和人一样，也有自己的命运”，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这些古书能拥有更好的命运。

如今，97 岁高龄的江老，依旧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讲起往事如在目前。他每天上午 9 时到店，下午 4 时半下班，坐在自己的“专座”上，看门外人来人往，四季变换，喂一喂叽叽喳喳的小麻雀，与四方读者和访客聊一聊书林轶事。这是一份坚守，更是一份传承。（据人民网）